

嘉庆《肥城县志》研究

姜复宁

提 要：嘉庆《肥城县志》纂修肇始于嘉庆十九年（1814），成书于嘉庆二十年，凡19卷，是清代肥城第二部县志。纂修者曾冠英时任肥城知县，同时又在金石学、书法学、考据学领域学养深厚，既是地方官又是学者的身份使其对方志纂修用功甚勤。在体例方面，嘉庆《肥城县志》在继承前代志书体例的基础上扩充条目、分类细致；在内容上，增补康熙《肥城县志》的阙略，收录诸多乡土文献；同时受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的影响，对地方史相关问题细致考证，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颇具特色。

关键词：曾冠英 嘉庆《肥城县志》 地方志 地域文化

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的地方志，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所谓“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志书多为士人在仕宦或随征之时游历山川，踏访古迹，采摭旧闻而成。这些地志成书时代与记述时代相合，其内容又是时人所记的当地之事，具有重要文献研究价值。肥城地方志纂修始于明隆庆六年（1572），由知县顾廷修主持，都察院右佥都御使李邦珍亦参与其事，此志记载翔实准确，后人称其记载肥城风土人情甚详，前代故实、山川人物等“班班可考而知也”^①。但遗憾的是该志屡遭兵燹，典籍荡然，早在康熙年间便“即有一二家藏，未见全瑜”，今天更是亡佚殆尽。

肥城现存最早方志于康熙十一年（1672）由知县尹任主持纂修，参与编纂者有尹足法、李运昌、王度等。康熙《肥城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凡12卷，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有藏本。康熙志之后百余年间，肥城没有方志的纂修。嘉庆《肥城县志》（以下简称“嘉庆志”）由知县曾冠英主修，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凡19卷。在此谨对嘉庆志纂修及其体例、特点和史料价值作简要概述。

一 曾冠英与嘉庆《肥城县志》的纂修

嘉庆《肥城县志》纂修过程中，时任肥城知县曾冠英不仅主持其事，还亲力亲为，“访录旧闻，搜采潜德，与邑之贤士大夫讲求讨论”，在嘉庆志编纂上可谓居功甚伟。曾冠英，字鹏霄，号云峰，惠州府和平县大湖镇人。冠英幼年失怙，由母亲朱氏抚养成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词垣，越明年改授肥城知县。^②曾氏生年志书未载，但在著录其著作时载“有《溯泗斋文稿》四卷，道光己丑六十一岁时刊行”。道光己丑为1829年，据此可知其生于1768年。至于其歿年，则无从考据。曾冠英工于书法，《皇清书史》载其“字觐轩，号云峰，广东和平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肥城知县，工书”^③。此处提到“觐轩”一字，未见他书记载，当为曾冠英字。关于曾冠英纂修县志一事，白廷鏞的记载较为详细：“南海曾君，以庶常改官，于嘉庆十四年出宰斯邑，为治五载，政事具举，又虑文献之或有缺坠也，于是访录旧

^① 尹足法：《康熙重修肥城县志序》，康熙《肥城县志》卷首，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1页。

^② 参见曾枢修、凌开蔚纂：民国《和平县志》卷16《人物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2册，第14页。

^③ 李放撰：《皇清书史》卷19，辽海书社，民国20年（1931）版，第12页。

闻，搜采潜德，与邑之贤士大夫讲求讨论，即旧志续而新之。”^①

从这段记载可知嘉庆志纂修始于嘉庆十九年。结合曾冠英也自谦为“续编”的史实，以及嘉庆《肥城县志》序言中，参与编修的李基熙关于此志编纂缘起的记载：“（康熙志）重修于国朝康熙壬子，文甚简质，期于传信，不事藻绩，盖其慎也，迄今百四十有二年矣。阅时既久，则其间事之宜补宜续者，及今弗修，恐自此以往，终将湮没而不彰，宁无遗憾欤。”^②可知，该志是在赓续康熙《肥城县志》基础上扩充体量、增补材料，并增加康熙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之间的史实而成的。嘉庆志纂成后，曾请王引之为撰序言，王序对纂修史实的叙述与白廷镛所载存在出入：“嘉庆十有四年，南海曾君以庶常改官令兹邑。越六年，百废具兴，乃以其暇披阅旧志。”^③由此来看嘉庆志纂修始于嘉庆二十年。该序文最后所载写作时间为“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六月朔日”。考虑到方志的纂修过程，以及曾冠英与王引之的联络、邮路时间等，我们认为王引之的记载是存在问题的，嘉庆二十年为志书最终定稿的时间，而其纂修起始年份当在此前。此外，白廷镛作为泰安知府，在曾冠英任职时间上的记载更为可信。因此，嘉庆志纂修起始时间当为嘉庆十九年，于嘉庆二十年上半年最终定稿。

曾冠英本人学养深厚，在任职肥城期间对乡土文献着意颇深，这在《肥城县志·金石志》的纂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氏在纂修《肥城县志》时发现前代所修县志对地方文献重视程度不够，为填补“旧志不载金石”的空白，特在嘉庆《肥城县志》第6卷设《金石志》以载录肥城境内金石碑刻。在《肥城县志·金石志》的前言中，曾氏指出“然前代轶事，以及年号、岁月干支、官爵、姓名，亦得以资考证”，高度评价金石文献的考证价值；而后指出“嗜古之士，于草莽中断碣残碑遇文字奇古，恒摩挲不忍释，更书之简编，诚恐风雨剥蚀，不常留天地间也”^④。作为“好古之士”的曾冠英，面对肥城境内诸多前代题刻，必定也“恒摩挲不忍释”“诚恐风雨剥蚀”，在石刻前留下长久驻足、不舍离去的背影。在保存史料的使命感和对仕宦所在的热爱上，曾氏对县志所收诸多石刻予以详尽、精确的探讨，石刻录文准确、载录地点详细，对于部分著名石刻如风雨竹、感孝颂碑、范蠡墓碑等还加以简明、准确考证，足见其编修着意之细、用功之勤。而《肥城县志·金石志》的成绩，可作为一窥曾冠英政绩的绝好文本，也是其个人政声口碑和金石研究两方面的注脚。为编纂一部质量上乘的县志，曾冠英付出极大心血，由白廷镛的序言可知，曾氏曾与邑内士人一起讨论编纂事宜，自己也广泛搜求材料，“网罗散失，摭拾遗文”，足见其对编修地方志的重视程度和“为乡邦著信史”的使命感。

清季学术昌明，宿儒间出，阮元将清前中期清代学术史概括为“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嘉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⑤。曾冠英在纂修嘉庆《肥城县志》时，其考据谨严、实事求是，便深受乾嘉学派学术特点的影响，这种学者修志的特点也使得嘉庆志比较成功。嘉庆志成书后好评如潮，时人赞其“义例谨严”“实事求是，渊渊乎文有其质矣”。该书是曾冠英在肥城任内重要贡献之一，而曾氏深厚学养以及在编纂付出和辛劳，也使得该书具有重要资料性价值，可谓肥城地方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综合记录。

① 白廷镛：《肥城县志序》，嘉庆《肥城县志》卷首，嘉庆二十年裕德堂刻本，第1页。

② 李基熙：《肥城县志叙》，嘉庆《肥城县志》卷首，第3页。

③ 王引之：《肥城县志叙》，嘉庆《肥城县志》卷首，第4页。

④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6《金石志》，第1页。

⑤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二 嘉庆志体例沿革及特点

“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輿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①但方志体例并非一成不变，方志体例随着时代变迁、具体内容增删，以及志书纂修者修志观念而变化或调整。这种体例变化并不仅仅是编修技术层面的差异，从中也可看出特定时段内地方社会变迁。以这样的观念考察嘉庆志体例变化，将其与明清以来肥城县志纂修史相联系，可以在较长时段中考论其体例沿革特点。

隆庆六年《肥城县志》早已亡佚，今无从得见，而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纂修时也未能见其原序，无法通过阅读留存的序言来探讨其编纂体例。不过，曾经阅读过隆庆《肥城县志》的尹足法在为康熙志所作的序言中提及隆庆《肥城县志》，从中可以管窥其体例安排若干问题：

故明隆庆壬申，邑侯顾公与中丞同川李公远稽近取，汇辑成书。山则牛岭陶麓，川则清河泉源，坛分南北，户列军民。至若上中下山土别四则焉，忠孝节义风余三古焉，以及县治、学宫、名宦、人物，班班可考而知也。^②

隆庆《肥城县志》在“远稽近取”基础上汇编成书，内容涵盖山川、祀祠、户民、风土、县治、学宫、名宦、人物等诸多方面。该书由肥城知县顾廷修和名宦李邦珍合作编修，二人皆学养深厚，因而该志可信程度颇高。但惜乎“兵荒叠见，旧简云亡，即有一二家藏，未见全瑜”，该志在康熙初年便以散佚殆尽，难以窥见全貌。且隆庆志纂修时已至明末，此后肥城便陷入动乱纷争之中。李自成“大顺”军于明末曾攻打泰安地区，明清易代的战乱更是使得泰山地区陷入“天崩地坼”之中。此期战乱频仍，肥城并无地方志编纂。

康熙十一年，“令天下郡国各上所志书，汇集编摩，用成垂世大典”^③。当时要求各地进呈方志，应当与《明史》纂修有关。清顺治二年（1645）设立明史馆，但未见其纂修实绩。康熙四年（1665）重开明史馆，旋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工作。康熙十八年再次重开明史馆，以徐元文为监修，《明史》纂修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此处所谓“垂世大典”所指似应为《明史》，可见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纂修是在朝廷诏令各州、府、县进呈方志背景下进行的，带有明确政治任务。康熙志由知县尹任主持编修，该志在邑人李运昌所撰志稿基础上“取其书而笔削之”，删削改订而成。李氏志稿纂修体例不能完全反映新的社会变迁，满足官民现实需求，因而在改订过程中尹氏考虑到“皇清定鼎，时移势易，不无变通之制”，更改了县志体例。康熙志存在未予分卷的弊病，兹据康熙志，将其目录整理如下：

表1 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目录

纲次	目次
輿图志	县境图、城治图、县治之图、学治图、星野、地理、疆域、形胜、山川、泉洞、乡社、风俗

①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② 尹足法：《康熙重修肥城县志序》，康熙《肥城县志》卷首，第1页。

③ 尹任：《重修肥城县志序》，康熙《肥城县志》卷首，第3页。

(续表)

纲次	目次
建置志	城池、公署、县署、庙祠、武备、铺舍、仓场、津梁、市镇、城集、乡集、坊牌、人丁、地粮、马政、物产
学校志	文庙、书籍、祭器
官师志	知县、县丞、典史、教官、教谕、训导、名宦、主簿
人物志	仕迹、孝友、贞烈、耆寿
选举志	乡贡、岁贡、例贡、制贡、武功、武进士、武举
古迹志	书院亭台附、景致、陵墓、寺观
诗文集	诗、记
灾祥志	灾祥

康熙志未分卷，大致为纲目体，继承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志书普遍采用的体例。^① 其舆图志除列出县境图、城治图、县治之图、学治图等地图，还将星野、地理、疆域、形胜、山川、泉洞、乡社、风俗等条目纳入其中。这种处理方式有图经的影子，“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②。以这种方式编排方志，旨在强调朝廷对地方的统治与控制^③，与清前期朝廷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与管理，进而强调正统性、压制反清思潮的政治目的有密切关联。相较隆庆志，康熙志体量增加，条目也得到扩充。扩充条目主要有疆域、形胜、人丁、地粮、风俗、物产等，这也反映出康熙志编纂带有为国家纂修史书服务的目的。康熙志在一年内成书，虽然是在既有志稿基础上进行删削，仍未免失之过速，且该志编纂有为纂修国史服务的资料性因素，因此在编纂时过于强调资料性。李基熙称其“文甚简质，期于传信，不事藻绩，盖其慎也”^④，在指出康熙志资料性价值的同时，也委婉地点出该书存在“文甚简质”，也即记载过于简略的弊病。在体例安排上，康熙志也存在欠缺，这主要体现在部分条目归并上存在疏漏，如将“名宦”条目归入“官师志”。经查核该条可知其中收录人物实际上在其他条目诸如“知县”“县丞”等处均有传记，而康熙志纂修时出于彰其事功的目的又单独摘录，创为新子目。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康熙志“官师”部分内部颇为芜杂，同一人重出两条子目之下，交叉重复。康熙志所存在的弊病，多少与受制政治任务，在较短时间内仓促成书，既无法进行大规模资料搜集与调查，又无法组织专人精心打磨、细细审读等有关。如何在继承前志优点基础上力争有所突破，既承其菁华，又汰其繁芜、增其简略，编纂一部体例精当、内容可信的志书，这是曾冠英纂修嘉庆《肥城县志》时颇为费心之事。曾氏对自己所面临困境并未讳言，在嘉庆志“例言”中明确指出“是编之作，较他志为难。凡志皆有所因，而兹则独近于创，盖旧志过于简略”；同时又说明了对康熙志予以增补的具体内容。

昔人之遗迹，阅世愈久，而嗜古之士遑遑于山穷水尽、人际罕到之区，不留余力，以相

① 参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文献》1988年第3期。

②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848页。

③ 参见王旭：《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④ 李基熙：《肥城县志叙》，嘉庆《肥城县志》卷首，第3页。

搜寻为其有，以广见闻也。然非确有考据，则不足以传信。旧本无古迹、金石二志，实属阙然，今即耳目所及者特为编入。

凡邑多山水者，阴阳、刚柔、燥湿之不齐，其物产不同而风俗亦异，如欲善俗则学校为先。此以养以教一定之次第也。至礼重祀事，赋惟则壤，以及建置、选举等类，各邑略同，不过举旧志所不备，与百余年来事之阙而未续者，增补焉已耳。

.....

人物列传旧志仅自明以来，然前代之彪炳宇宙者系岂无人？即如冉子卒葬中都，迁于东原，人所共知，而《大明一统志》已载冉伯牛，先人墓在陶山阳。此其为桑梓之地明矣。其余采入者，亦皆本之历代史传。至近今人物，则严加询核，虽善善从长而初无溢美，至生者皆不得立传，亦遵古人盖棺论定之说。意以其人往矣，而嘉言懿行不共销沉，则没世之称为足贵也。不然，恐不免于谀且滥矣。

班固《汉书·艺文志》分经史子集，盖国史也。兹为邑志，则志一邑之文而已。旧志所载，寥寥数篇，今更为搜辑，得诗若干、文若干，分作二卷，序之于人物列传后，盖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有自来矣。^①

肥城知县为曾冠英出京后担任的首个职务，此时曾氏年富力强，颇有干事创业雄心，对增补旧志、为地方撰写信史的史志编纂工作带有极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之其学养深厚，在金石、考据等领域都颇有见地，因而嘉庆志纂修严谨细密，对诸多前代方志未予重视的史迹、轶事搜罗载记，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嘉庆志凡19卷，具体如表2，其中部分总目如“形胜志”“金石志”等在嘉庆志中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内部并未再细分子目。

表2 嘉庆二十年《肥城县志》目录

卷数	目录	总目	详目
卷一		天文志	星野、历代天文
卷二		地理志	沿革、疆圉、四乡、三十三社、四大集
卷三		山水志	山、泉、八景
卷四		形胜志	
卷五		古迹志	里居、亭台、坟墓
卷六		金石志	
卷七		物产志	谷类、蔬类、果类、花类、草类、木类、药类、禽类、兽类、鳞类、货类
卷八		风俗志	
卷九		学校志	庙制、位制、祭器、乐器、舞器、乐章、祭仪、书院
卷十		祀祠志	祀祠、寺院庵观
卷十一		田赋志	户口、地亩、贡赋、盐法、驿递、铺舍、兵防
卷十二		建置志	城池、属廨、仓廩、桥梁、渡口、牌坊

^①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首《例言》，第2—4页。

(续表)

卷数	目录	总目	详目
卷十三		选举志	进士、举人、拔贡、岁贡、制贡、恩贡、例贡、世职、例用文职、武进士、武举、武职、例用武职
卷十四		耆寿志	
卷十五		职官志	知县、教谕、县尉、主簿、县丞、训导、典史、千总、宦迹
卷十六		祥异志	
卷十七		人物志	列传、列女
卷十八		艺文志(诗)	
卷十九		艺文志(文)	

相较于康熙志，嘉庆志大部分条目得到保留，部分条目改变名称，如康熙志“官师志”在嘉庆志更换为“职官志”。也有部分条目删减，如康熙志中所载“人丁、地粮、马政”三部分内容，嘉庆志归并为“户口、地亩”。嘉庆志新增众多条目，如金石志；将康熙志中置于建置志之下的“物产”子目单独列为物产志、置于人物志之下的“耆寿”子目单独列为耆寿志等。金石志的增加与嘉庆志纂修者曾冠英本人的学术专长有关，而物产志的增加则说明地方经济得到较好发展。将高寿之人列入单独设立的耆寿志，则说明百姓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从编排方式来看，嘉庆志与康熙志均采用总目下分详目方式，但嘉庆志分目更为细密，在选举志、职官志详目下又按照朝代予以划分，可谓纲中有目，目中断代，条目更为细致。此外嘉庆志体量较之康熙志也有明显增加，以艺文志为例，康熙志失收诸多前代诗文，如李完《宋杨氏义居碑记》、王载《元抹汉遗爱碑记》、元好问《送天倪子归布山》等，而嘉庆志广收诗文，将其依文体分列于卷18、卷19之中。这样的分类方式是否妥当仍可讨论，但之所以分列两卷，所收艺文数量较多、体量较大或许便是原因之一。

与康熙志相较，嘉庆志另一突出特点便是在各卷之前有一段引言，通过这样的方式对该卷所记叙内容进行汇考，以便读者对各纲目制度源流和背景有所了解。通过这些汇考可以看出嘉庆志对考镜事物本源的努力，这也与地方志编纂目的密切相关。地志作为史部文献门类，其纂修目的之一便是反映古今原委，以期通古今之变，帮助读者厘清某地各类历史的源流。而以引言方式对所叙述内容予以汇考，需要深厚学养、开阔视野和广博知识面，对纂修者的文献阅读和学养积淀提出较高要求。谨选取卷八引言为例。

上之所被谓之风，下之所习谓之俗。俗也者，每缘风而为习尚者也。其俗既成，遂流于千百年而不可易。昔周公以周道治鲁，崇礼教，重信义。孔子设教洙泗，其民皆知好学，尚礼仪，重廉耻。流风余韵，至今犹存。汉武帝尝言“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其所由来者渐矣。县居鲁之北境，近圣人之居。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士好诗书，民勤稼穡。近世以来，其风气渐不古，若有相习而不知其为非者，今举俗之美恶数大端，以备观风者之采择，庶几倡率中激励之，一变至道，其在斯乎！作风俗志。^①

^①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8《风俗志》，第1页。

由此段内容,应为曾冠英参阅众多文献后感而发。由文意可见,汇考叙述内容的目的在于考证肥城风俗源流,同时为现实社会治理提供借鉴。此处对齐鲁风俗的追溯,特意点明自周公、孔子的文化传承与齐鲁之地“崇礼教、重信义”“尚礼仪、重廉耻”的传统美德,意在劝诫人们自觉赓续优良传统,匡正社会风俗。

嘉庆志对地方史予以关注,指出“古人之创建,数代而后,不能无兴废变迁。或考之传记,或得之见闻,今昔之间有殊致矣”^①。因而在“古迹志”部分对肥城历史古迹予以考辨,“间有所得,不妨出以独断,诚不愿袭前人之谬,亦将就正博雅,庶有异于耳食云尔”^②。如对肥城石门是否即是“子路宿于石门”之处的的问题,曾氏作了一番考证:“石门,春秋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杜预注:‘齐地,又曰在卢县西南济水之门。’今邑西北境有石门,建仲夫子祠由来已久。其地东北去长清县六十余里,东去大清河十余里。按长清即卢县,大清河即济水,是即子路宿处也。而阎百诗据《太平寰宇记》:‘古鲁城凡七门,次南第二门名石门。’以为鲁之郭门,孔子辄环四方久,命子路归鲁视其家,甫抵城而门已合,只得宿于外之郭门。窃意子路从孔子历聘于外非一日矣,列国皆知鲁为父母之邦,尤而相识,固非昔沮溺丈人辈,匿迹泉林,偶然相遇,姑为疑问而讽且讥之也,似亦未为确论。至赵地之石门桥亦有仲由夫子宿处碑记,更属附会。”^③

关于子路夜宿石门一事中“石门”确切所在,前代学者各持己见、聚讼不已。曾氏的考证是对这一争议的回应。他通过查考古地理材料,并结合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的史实,从肥城石门实际位置与杜预注文相合、鲁国守门人不可能未听说孔子之名两方面着眼,认为子路夜宿的“石门”即今肥城石门,反驳阎百诗说法,指出赵地石门桥的碑记乃是民间附会产物。在清季儒学大盛的时代背景下,石门因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夫子自道,更带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和儒家文化底蕴,因而成为著名景点。曾氏对石门的考证带有一定现实意义,从中也可看出清代考据学对志书编纂的影响。

诚然,嘉庆志并非完美无瑕,如部分子目的归类与安排存在可商之处,该志的形胜、风俗、祥异等门类所载也较为简略。光绪《肥城县志》序言提及“参诸旧志,疏略颡谬”,乃是委婉批评嘉庆志存在的粗疏、讹误之处。然而即使如此,嘉庆志史料价值仍不可忽视,在地域文化与地方史研究领域值得我们关注。

三 嘉庆志史料价值略说

方志作为地域文化研究材料的渊藪,其所载录的诸多史料数量庞大、来源多元,且均与一时一地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社会生活图景密切相关。此外,因为县志本身所着眼的地域范围较小,其中所记载的史料往往是正史和其他史籍所未载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嘉庆志传世数量较少,长期未被重视,其在文学文献及历史文献两个方面均有重要史料价值。

一是文学史料的渊藪:作品辑佚与作者考证。由于地方文人名气往往不大,其诗文作品的流传多局限于一地的知识阶层中,受制于多方面原因,这些文人往往没有文集刊刻传世,即使偶有刊刻,也因其印数较少、名气不彰等难以存留后世。在这样书阙有间的语境下,方志便成为载录地方文人诗文创作的重要载体。前代学者也已注意到此,在从事文学总集编纂、文学作品辑佚等工作时,对地方志中所载录文学作品的价值高度重视。但由于我国方志数量众多、内容芜杂,因

①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5《古迹志》,第1页。

②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5《古迹志》,第1页。

③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5《古迹志》,第7页。

而在文学总集的编纂中不免有失考、失校现象，嘉庆志艺文部分搜求详尽、体量颇大，收录诸多散佚诗文作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并未得到相应总集编纂者的重视。如徐世隆《送天倪子归布山》、李之绍《县尹刘君遗爱颂》、张起岩《瞻岱亭记》等作品均未见载于相应断代文学总集，幸赖嘉庆志收录而存留于世。嘉庆志《金石志》中载“茹庭坚咏落石泉诗石刻，在同川书院屋壁”一条^①，卷18《艺文志·诗》录全诗：“精舍开基叠嶂前，须知神异出天然。蓦从山上起飞石，特向岩隈生冷泉。积聚一池秋湛湛，放流满院夜涓涓。济民利物功殊大，岂止常程鼎饪煎。”^②此诗《全宋诗》失收，这一诗碑今存山东肥城牛山国家森林公园，经实地寻访发现此碑已从中部残断，且断裂部分早已无迹可寻，补苴该诗仅能依靠方志所载。由此可以看出前代方志记载对后世研究者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方志研究地域文学者提供启示：在运用地方志材料从事文献研究工作时，对于部分碑刻不妨采用实地寻访的方法予以探赜，往往有新的甚至意外发现。此外，前代志书载录时，此碑仍完整无缺，今则变为残石断碣，这样的现象也提醒我们，碑刻的风化破坏现象不容小觑，对于部分有重要文献资料价值的碑刻应当尽早予以寻访，并尽可能地完整、全面收录碑文，为研究工作提供扎实可信的材料。

除为散佚诗文辑佚提供材料来源外，嘉庆志对诗文作者的考辨也十分用心，对康熙志已有收录的部分诗文，并未简单收录，而是对其错误之处予以更正。如翟升《题左丘明墓》一诗，康熙《肥城县志》亦有录，但未署作者名，将其置于王去非《题左丘明墓》，而以“又”字分割，可见康熙志以为此诗为王去非所作同题之诗的又一首。^③嘉庆县志则将其改置于翟升名下。^④此诗又见于乾隆六年（1741）增订抄本《左传精舍志》，所载作者为翟升，诗题作《题左丘明墓》。^⑤由该诗内证来看，其作者应不是王去非。该诗尾联“前弊革除今可喜，尽归醇德作诗功”，其中“醇德”所指即是王去非，而王氏“至得圣门教仁教孝之旨，人皆以为独厚于一己也”，不可能在诗中如此明确地颂扬自己。由此来看，嘉庆志的移置是有其文献依傍的，也符合实际情况，这也说明曾冠英在纂修嘉庆志时对文献的辑考求索用功之深。

二是历史材料的汇集：社会经济与民间风俗。相较于前志，嘉庆志体量较大，所保存史料在种类上更为多元，数量上更为丰富。同时因其编写方式条理清楚、纲举目张，使研究者可以准确迅速地检索核心史料。嘉庆志所载众多内容中，最为集中、数量也最为丰富的主要为两大类，其一为明末清初时期和康熙至嘉庆百余年间社会经济材料，其二则是民间信仰与风俗史料。对这些史料的辑考与分析，可以补苴正史所未备、扩充正史所不详，为清代历史研究，特别是地方治理与社会风俗史研究提供帮助。

嘉庆志中所载录的赋役、户口等内容，数量相当精确严谨，如卷11《田赋志》中所记载的贡赋情况：“人丁完赋银一千九百八两两三钱。每丁征银一千五分，摊入地亩。本县应摊征银二千一十四两一钱七分九毫一忽七微五尘五渺七漠五埃一纤一沙，内除冲压除豁应增丁银三十二两八钱五分五厘一毫六忽七微六尘五渺七漠五埃一纤一沙”，“米六千一百一十二石一斗二合三勺八撮八圭七粟二粒。每亩正供杂办并胖衣等银七分六厘五毫九丝三忽四微九尘七渺九漠一埃四

① 参见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6《金石志》，第1页。

②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18《艺文志·诗》，第7页。

③ 参见尹任纂：康熙《肥城县志·古迹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117页。

④ 参见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18《艺文志·诗》，第16页。

⑤ 参见王惟精撰：《左传精舍志》卷4《艺文志》，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乾隆六年增订抄本，肥城市党史史志办公室影印本，1998年，第43页。

纤，麦一合八勺六抄九撮九圭一粟一颗，米二升七合一抄四圭五粟二颗”^①。

这样详尽精确，甚至近乎于“锱铢必较”的记载，显然系以官方档案为材料来源编写而成。这种有据可查、有本所依的史料来源，以及其中记载的田亩、户口数量，每年征发的钱粮数目等可信程度相当高，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丰富。在记录田赋时，方志编者记录“冲压除豁”对应纳赋税数量的影响，而“每亩正供杂办并胖衣等银”的说法更是说明赋税的组成结构。清代以田赋、丁银为正税，那么此处所谓“杂办”则应是除却田赋、丁银以外的杂项税收情况，这样的记载为探讨清代地方税收的组成结构、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甚至于探讨赋税运行管理机制来说，都提供了十分详尽精确的第一手材料，对社会经济史研究颇有裨益。

此外，由于方志本身记载内容特点，其中还有部分史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密切相关，这应当是修志者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因而方志在民俗研究中向来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吉川幸次郎曾有这样的论述：“盖中国上世之俗，《礼记》月令篇书之，宋以后近世之俗可征之于《岁时广记》以下诸方志。独魏晋南北朝之俗，上承秦汉，下启宋元，舍此书无由求之，此其所以尤为贵。”^②这一说法虽是为中国古代民俗类书《玉烛宝典》而发，但是其中所谓“宋以后近世之俗可征之于《岁时广记》以下诸方志”的观点也从侧面反映地方志所载录民间信仰、民俗活动内容为民俗学研究所提供第一手材料价值。

嘉庆志中专设《风俗志》部分，对当时肥城地区的社会风俗予以描摹，“今举俗之美恶数大端，以备观风者之采择，庶几倡率之激劝之”。这样的处理方式客观上保留了丰富的民俗材料，可以直观清晰地看出清代肥城地区民间风俗的新变。如对清代肥城地区的婚俗的记述，便从历史的角度着眼，对嘉庆时期肥城婚俗与此前的不同进行了比较：

婚备六礼，存者仅有一二。初用媒氏结二姓之好，不闻纳采、问名。通启近于纳吉，而纳征又缺，请期则婿家具筵席邀女家共择吉日，与古亦异。亲迎用彩舆仪仗等物，较古礼过繁，然犹遵阳去阴来之义，不至与齐俗同讥。合卺又太略，鼎鼐菹酱之陈无有也。礼妇入门，质明见舅姑。今则三日而后见，已成妇矣，舅姑犹待若宾客，是遵何道哉？^③

这实际上是一份民众婚礼流程图，记载了当时肥城地区结婚过程。由其记载不难看出，当时肥城婚俗较之传统“六礼”，已有明显简化，这也是民间风俗演化的主要路径与方向之一。但与今日肥城婚俗相较，仍然保留了诸多传统特征，如能将其与清代肥城一带文人所撰写的其他笔记史料予以对读，或可发掘当时的婚俗礼制与相应的社会观念，考论其社会文化内涵。

除此以外，嘉庆志中还保留诸多有价值材料，如学校志中的文庙祭祀之礼、祥异志中的清代自然灾害情况等。对清代地域史研究，这些材料可以作为个案予以“解剖麻雀”式考察，抉发其中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民间风俗史信息，进而为地域文化与地方史研究提供材料依傍。

结 语

诚然，嘉庆《肥城县志》由于受到编写时代限制、众多编写人学识水平不尽相同等原因的影响也存在着部分疏漏，而当时所记载的部分史迹，在今天看来也发生了新变，如上文曾提及的

①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11《田赋志》，第3—4页。

② [日]吉川幸次郎：《玉烛宝典解题》，《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1968年，第17页。

③ 曾冠英续编，李基熙分纂：嘉庆《肥城县志》卷8《风俗志》，第1页。

茹庭坚《留题郁葱山资圣院落石泉》诗碑，光绪《肥城县志》载录更为详尽。光绪《肥城县志》卷1《方域志》在记述金牛山名胜时载“书院垣间嵌一诗刻，载《留题郁葱山资圣院落石泉》。太常少卿通理郡事茹庭坚，熙宁癸丑年上石”^①。对读可见嘉庆《肥城县志》著录此碑时未详载作者信息和撰写时间，仍有可补之处。但总体来看仍是瑕不掩瑜，嘉庆《肥城县志》仍有着重要文献价值。

总之，嘉庆《肥城县志》编纂主持者，同时也是主要编纂者之一的曾冠英学养深厚，又深受乾嘉时期考据风尚影响，十分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对于艺文、金石细流兼纳，保存了大量的乡邦耆献。而对于地方名物及地方史相关问题则注重源流考辨，具有清代朴学的色彩。主纂官员的学养和严谨认真的编修态度，使得此志质量上乘。同时该志在旧志基础上，扩大文献搜集范围，保留了众多社会风俗相关的史料，对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作为清代山东社会风俗史研究的个案予以考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山东府县志辑》出版发行

2020年8月，《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山东府县志辑》(全31册)，作为《中国地方志集成补编》的一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精选影印1949年以后未曾整理或版本珍稀、流传较少的69种山东省旧方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书中所收版本多为1949年后首次影印出版，与《中国方志丛书·山东省》《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及“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书”所收山东省旧方志等同类出版物几乎没有重复，且其中不乏志书佳构。如雍正《乐安县志》，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纂修，1949年后此志无影印本、点校本行世。李氏雍正志继康熙志而修，翔实具体，有存古之功，价值很高，《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不愧山东名志”。万历《蒲台县志》是最早的蒲台县志，1949年后亦无影印本、点校本刊行。该书篇目齐备，记述赅要，且其记载多与当地民生攸关，保存颇多明代经济资料，是山东方志之佳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该书的出版使度藏各地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山东方志化身千万，直接服务于方志学研究，亦可供文学、历史学、古代文学等多学科所取资；同时是对山东方志类古籍和民国文献再生性保护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山东省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措施。其中记载的大量自然风光和人文遗迹，可以激发爱国和热爱桑梓的热情，对于开发山东省旅游文化资源，也势必会有助益。

^① 邵承照纂：光绪《肥城县志》卷1《方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5册，第24页。